

【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越关系史专题】

南越阮氏王朝的科举取士及其影响

陈文

(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越南黎朝中兴后分裂为北郑南阮。南越阮氏政权实行军事化管理,以佛教为统治思想,不尚儒学,开科取士较晚,试法粗疏,并具有南越特色。虽然科举考试选拔了一批儒学人才,但在南越的社会流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文学儒士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越南南北科举取士试法不同,从中可窥见科举在南传过程中因应当地形势变化而呈现出北橘南枳的特色。

【关键词】南部越南;阮氏王朝;科举取士;影响

【中图分类号】K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0)01-0146-07

越南黎朝中兴以后,北郑、南阮表面上奉后黎正朔,但各主一方。南越阮氏政权实行军事化管理,以佛教为统治思想,并不像北越郑氏政权那样重视儒学,开科取士也较北方为晚,并具有南方特色。因为南越阮氏王朝的科举考试试法粗疏,在越南科举史上并不重要,所以它并未得到越南科举研究者的重视,国内学界也甚少探讨。本文拟对南越阮氏王朝的科举考试及其影响作些探讨,从中窥见科举制度在南传越南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越南南北地区的不同影响。

一、阮氏王朝统治下的南越地区

1527年莫登庸篡立莫朝后,越南黎庄宗在大臣阮淦的支持下,在南方中兴,与北方的莫氏抗衡。阮淦死后,由其婿郑检辅佐黎王朝,原先联姻的郑氏家族和阮氏家族因利益而反目成仇,阮淦的儿子阮潢

于1558年请往顺化。郑氏灭莫后,独揽军政大权,世袭为王,史称郑主,黎氏王朝仅是傀儡。而阮潢则乘机在灵江以南地区,以顺化为中心,扩充实力,逐渐形成了与郑氏对峙的阮氏王朝¹,我国和日本史籍称其为“广南国”,西方称之为“交趾支那”。

与北方郑氏政权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经营方式不同,阮氏王朝“一切政策都是为封建战争服务”^{[1]220-221},充分发挥南部地区“山产金铁,海出鱼盐”的地理优势,推行东西南北的不同策略。向北则防御和抵抗郑氏军队的进攻,在1627~1672年间,郑阮军队展开了7次较大的争夺战争,不分胜负,南北对峙达一百多年。向南则不断推进,扩充领域,于1697年吞并了占城,又从真腊国夺得了现今的南越六省之地,把领土推到了半岛的南端。越南史学家陈重金称阮氏政权最大的功绩是开拓疆域,使版图增大,人口加多,招募国内穷苦之人去开发南部,形成今日富甲天下的南越地区^{[2]247}。向西部山区则推

【收稿日期】2009-07-03

【作者简介】陈文(1965-),女,广西阳朔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越南历史文化和中越关系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越南科举制度研究》(批准号:08HQ0040)。

¹ 南越阮氏王朝系:(1)阮淦-阮潢(1558-1613年),称阮太祖(仙王)——(2)阮福源(1613-1635年),称阮熙宗(佛王)——(3)阮福澜(1635-1648年),称阮神宗(上王)——(4)阮福灏(1648-1687年),称阮太宗(贤王)——(5)阮福漆(1687-1691年),称阮英宗(义王)——(6)阮福澗(1691-1725年),称阮显宗(明王)——(7)阮福澍(1725-1738年),称阮肃宗(宁王)——(8)阮福澗(1738-1765年),称阮世宗(武王)——阮福淳(1765-1777年),称阮睿宗(定王)。参见山本达郎《越南中国关系》,日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703页。

行睦邻的政策,为阮氏北抗南进提供和平的周边环境,而西部地区的物产则成为阮氏海上贸易的出口产品。向东海域,阮氏王朝则同外国发展贸易,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以及葡萄牙、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的商人前来贸易,阮氏王朝以南越地区的大米和周边的香料、矿产和土特产品换取外国的大炮和兵船,又从港口商贸中收取海关税,这既增强了阮氏王朝的军事力量,又刺激了沿海港口如会安、河仙、边和等地的繁荣以及南部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北部地区自郡县时代起就受中国文化的熏染,依附于土地的村社居民较为稳定,自陈朝末期起越南统治者开始崇尚儒学,经过明朝在交趾郡20年的儒学普及,到黎朝,统治者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制度,儒家思想在北部地区已经占居主导地位。而阮氏王朝统治的南部地区,土地广袤,人们不断开垦新的地区,居民来源多种多样,文化亦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是融合了佛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占城文化,已经扎根于中南部地区;二是从各地迁移来的居民,有的是从越南北部南来的难民、流民、贵族、农民,有的是从中国大陆迁移来的华侨,这些移民大多信奉佛教,也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三是周边少数民族的土著文化,也具有自己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阮氏与北方分裂而建立王朝,违背了儒家的正统思想,所以阮氏既不用被它征服的占人文化,也不崇尚北方的儒学,而是把佛教奉为主导思想,当时上自王宫贵族,下至军民百姓信佛甚盛。与此相对的是,1647年阮氏王朝才开始设科取士,中格的文学、儒学人才可进入政府部门。到黎朝后期,阮氏王朝逐渐由军管政权向比较明显的平民化政府模式转变^{[3]52},一些统治者开始重视儒学和学校教育,尤其是在华侨开发的南部地区,如河仙镇、嘉定府、边和镇,仿中国制度,尚儒学,设学校,兴私塾,文化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汉文化不断得以传播,但与北方郑氏政权沿袭黎朝一套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相比,阮氏的学校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总之,阮氏王朝的一切政策均服务于战争,文物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统观南朝之政治,类如官制、试法,皆不如后黎之详,而当代刑书,尤为缺典。盖草创之初时则然也。独至练兵讲武一事,历代相承,以为要素,视北河实优胜焉,此所以铸尚武之精神,而达复仇之目的欤。”^{[4]卷三}

二、阮氏王朝的科举考试

每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环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北橘南枳,阮氏王朝统治下的南越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与郑氏政权治理下的北越地区均有所不同,南北政权举行的科举考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北方郑氏政权仿照中国明清制度,科举取士成为朝廷选择文官队伍的主要工具,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互动发展,儒学和汉文历史文学在北越地区不断得以传播和发展。与黎朝前期以及北方郑氏政权的科举考试不同,南越阮氏王朝的科举试法粗疏,并具有实用性的特征。越南史籍对阮氏的科举考试只有零星的记载,现据所搜集的越南汉喃文献,对阮氏王朝科举考试的开科时间、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录取恩格等情况作些考述。

(一)开科时间

北方郑氏政权一直坚持实行黎朝三年一大比的科举取士制度。而南方阮氏王朝因为实行全民皆兵的政策,不仅设科较晚,而且没有形成正规化的开试制度。1646年七月,阮氏王朝始定科举试法,次年八月“初开试科”,首次举行正途试和华文试^{[5]卷三10-11},这已是阮潢1558年南下顺化后一个世纪的事了。1646年七月定九年一试¹,但后来并未按此制开科,或一年两试,或一二年一试,或五六年一试,或八九年一试,甚至十数年也未有开试,是否开科、何时开科,全由当时的形势稳定与否、阮氏统治者对儒学和文官重视与否而定,可以说,整个阮氏王朝,一直没有形成固定的开科时间。

(二)考试科目、内容与铨除

北郑承袭黎朝前期的科举制度,考试科目有进士科、宏词科、东阁科、士望科、制科、武举等,其中进士科是最重要的科目,也是北方士人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而南越阮氏王朝开设的科目明显不同,有正途试、华文试、饶学试、探访试等,所考内容也与北方不同。

(1)正途试

1646年七月,阮氏王朝定正途试试法,正途士子齐就公府应试,考三日,第一日试四六骈文,第二日试诗赋,第三日试策问,以文职知府、知县任初考,以该簿、记录、衙尉任监考,以内左、内右、外左、外右任监试^{[5]卷三10-11}。正途试,又称文职试,是阮氏王朝

¹ 也有“六年一试”之说,见[越]黄高启《越史要》卷三载,阮福源定正途试和华文试“初行六年一试之法”。

选拔文职官员的考试,但从所考的内容来看,阮氏初开的正途试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字写作和问题分析的能力,与北郑的进士科相比,少了一场儒家经义,这是阮氏政权初期不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具体表现。到1740年八月,阮福阔更定正途试试法,第一场试四六,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经义,第四场试策问^{[6]卷13}。在原来三日考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日考儒家经义,与北方郑氏王朝的进士科考四场(第一场经义,第二场制诏表,第三场诗赋,第四场策文)^[7]相近,这表明在18世纪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在南越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阮氏王朝开始重视儒学,重用儒士。

北郑时期的科举取士称号与恩格基本上沿袭黎朝前期洪德年间(1470~1497年)的试法。乡试、会试中场者,根据考生年龄、中场次数、官庶出身等不同而授予不同的职务,庶人、军人乡试中三场者称生徒,或称三场生徒;中四场者充国子监增广生,称乡贡或贡士;官员子孙乡试中三场者称儒生,中四场者入国子监与国子监学生统称监生^{[8]正编卷十九21-22}。对“监生、儒生、学生、按吏、各衙门吏,会试累中场,年深知务勤干及有军功等项,初授知县、知州、县丞、同知州、首领、序班等职”^[9]。依洪德三年(1472年)颁布的进士资格例,北郑进士初授八品至六品官职,第一甲第一名授正六品官职,第二名从六品,第三名正七品,并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加一级^{[10]本纪卷12黎纪691}。

南越阮氏王朝开设的正途试,中格者也直接任以官职。据1646年七月颁布的试法,正途试中格者分甲乙丙三等授职:甲项称监生,可任知府、知县;乙项称生徒,可任训导;丙项也称生徒,可任补生或饶学^{[5]卷三11}。1695年三月开科的正途试,取监生5名,生徒8名,饶学15名,监生补文职知县,生徒补训导,饶学补礼生^{[11]卷七10}。到1740年八月更定试法规定,正途试第一场考中者称为饶学,可免五年差役;第二场和第三场考中者,则复其身,免终生差役;第四场考中者称乡贡,可补知府、知县,训导^{[6]卷13}。由此可见,阮氏王朝的正途试中格者初授职逐步与黎朝前期和北郑进士科恩格制趋同。

(2) 华文试

正途试是选拔文职官员的考试,而华文试开始是选拔吏员的考试,中者补三司书手^{[4]卷三},主要从

事文秘性的工作。1646年七月阮氏王朝规定,华文试九年开科一次,考三天,每天写诗一律,中者分为三项,补舍差司、令史司、将臣吏司等三司文职人员,并准为饶学^{[5]卷三11},相当于正途试中格三等中的最末一等。阮福凋时(1691~1725年),华文试的规格有所提升,始设庭试,并御赐考试题目^{[11]卷七19}。

(3) 试饶学

试饶学又称“秋围会试”,正途士子和华文士子一同考试,“国初选期合试正途和华文,谓之饶学”。1681年二月,阮福濒令试饶学,只允许正途士子应试,华文士子不得预试^{[12]卷五22}。1694年二月,阮福凋令试饶学,正途、华文士子同试^{[11]卷七8}。1707年,阮福凋下令正途、华文士子有稍通文学、谙详书算者,于第二年三月在正府应试,考文学和书算等内容,中格者准为饶学^{[13]卷八2}。后来饶学试停罢,将正途试和华文试分开考。

(4) 三司试

1695年八月,阮福凋在主府开三司试,三司试指舍差司试、将臣吏司试和令史司试。从考试内容来看,舍差司试,考问一岁之兵丁、钱谷、决狱之事,注重考核举子们对一年内兵丁、财政、刑法等现实问题的了解和处理能力;将臣吏司试和令史司试,则只要求作首诗而已^{[11]卷七10},侧重考核应试者的文学写作才能。三司试中格者可任三司之文职官员。

(5) 探访试

1675年四月,阮福濒始开探访试。其试法,考一天,问以兵民情状及北方黎郑之事。中格者,可任舍差司、将臣吏司、令史司等部门的有关职务^{[12]卷五18}。这主要是因应当时南北战争之形势,以选拔军事战略人才。

(三) 开科次数与取士人数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阮氏王朝开科次数和取士人数并没有一致的统计。笔者据《大南实录前编》记载统计,自1647年开科到1777年阮氏王朝灭亡,有数字可查者,阮氏王朝开科20次(一般是正途试、华文试、探访试等数科并试),取士629名。其中,正途试开科15次,取士323名;华文试开科13次,取士279名;探访试开科6次,取士27名;乡试科和三司试开科次数和取士人数不详。阮榜中《越南开国志传》记载的相关科次和取士人数在个别地方有些出入¹。黎朝学者黎贵惇言,“一有考试,所取华文

¹ 庚子年(1660年),《大南实录前编》卷四记为取正途中格5名、华文中格15名,而《越南开国志传》记载为正途中格5名、华文中格18名。乙卯年(1675年),《大南实录前编》卷五载取正途4名、华文17名,而《越南开国志传》卷八记取正途、华文中格30名。

学生五倍正途”^{[14]卷五, 143}, 在阮福澜、阮福濒统治期间(1635~1687年), 每次考试, 华文取士均比正途取士多出五倍甚至更多, 如阮福濒三十五年(1683年)取正途中格 4 名、华文中格 34 名。但从阮福澗(1691~1725年)以后, 所取的正途中格人数多过或相当于华文中格人数, 如 1695 年取正途中格 133 名、华文中格 92 名, 1713 年取正途 97 名、华文 41 名。录取正途士子的人数不断增多, 表明阮氏王朝对文职官员和儒学思想逐渐重视。

总之, 阮氏王朝科举考试试法粗疏, 开科取士只是选拔一些文职官员和吏胥, 黎末黎贵惇在巡视广南地区后如是评价阮氏的科举取士: “前阮氏专命一方, 止有秋试, 但专用吏胥, 不尚文字, 鲜有搜探俊异。”^{[14]卷五}

三、科举取士在南越的地位与影响

在黎朝南北对峙时期, 郑氏政权治理下的北越地区, 沿袭黎朝前期的科举取士制度, 文举和武举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和官僚队伍的主要手段, 也是社会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 学校教育也以科举取士为旨归, 所以北越地区的儒家思想和汉文史学、文学得以承继和发展。相比之下, 阮氏王朝统治的南越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阮氏初来广南时, 其官吏由郑氏政权派遣, 到阮福漆时期(1687~1691年)开始握有设官之权。阮氏王朝实行军事化管理, 科举取士不仅开科较晚, 试法粗疏, 而且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如郑氏统治的北越地区。究其原因, 主要有两方面:

1. 军功一直是阮氏王朝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

阮氏政权实行全民皆兵的政策, 决定了军事人才在阮氏政权中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从官僚人数来看, 武职官员在阮氏王朝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其俗重武, 裂爵士, 称为郡公几百十员, 侯以下无算。文臣百, 执掌文书故事而已”^{[15]12}。阮氏政权的高层官员亦以武职人员为主, 文职官员只是起着辅助的作用, “权要之家, 委戚族典司, 而华文佐之”^{[14]卷五}。

早年跟随阮潢南下的北方贵族构成了阮氏政权高级官僚队伍的重要部分, 而在阮氏政权的将帅中, 来自清化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南列传前编》

卷四《诸臣列传二》所列的 22 位一品大臣中, 除有 2 名籍贯不详、1 名为广南淮川人外, 其余 19 名全是清化省人, 阮久乔、张福奋(其子张福岗、孙张福识、张福攀)、宋大有、阮德宝、宋文魁、裴公继、阮锡林等大将均来自清化贵县¹, 此外, 大将阮有镒家族、宋福治家族亦来自清化贵县, 大将陶维慈、阮有进则来自清化玉山县。这些跟随阮潢南下的清化贵族均以军功擢升, 其子孙后代也以世荫擢用, 在阮氏王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战功一直是南越地区社会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 不少家族以军事起家, 世代以武略为阮氏王朝所擢用。这些武将兵士不仅因战功获得升迁, 而且还常有大量的金银赏赐, 如 1655 年, 北方郑柁派郑椿领兵过河南侵, 阮福濒派阮有镒、阮有进率军还击, 阮军大捷, 阮福濒遂赏阮有进黄金 30 两, 白金 100 两; 赏阮有镒黄金 30 两, 白金 80 两, 余诸将赏赐各有差^{[16]卷四 10}。因为战争立功受赏, 一些家族上升到上层阶级, 不少家族则保持世代荣华富贵。

2 卖官鬻爵是构建阮氏王朝基层官吏队伍的主要方式

与北方郑氏政权官员薪俸制不同, 阮氏政权的官吏没有薪俸, 其俸禄是靠收取所辖地纳税人(饶夫)的税收和礼物, 饶夫人数则视该官员职位的重要程度而定^{[3]144}。政府除了从军队中擢用大批武职官员、从科举任用一批文职官员外, 还大量卖官鬻爵, 收钱授官, 并将其作为派任下层官员的主要方式。

阮氏王朝下层官僚机构收钱授官, 根据官职的大小收取不同的钱物, 官员向政府所交的钱包括买委任状、官印、国王生日、新年礼品、上级官员的槟榔, 甚至宫廷侍女的槟钱。如申请提升知府需花 664 贯 186 枚钱, 申请提升知县要花 277 贯 105 枚钱, 申请该总(区长)花 165 贯 135 枚钱, 申请沿吏(县府低级官员)要花 82 贯 270 枚钱(2 贯相当于 1 两白银)^{[3]141-142}。由于交钱就可以得到官职, 任官后又以税收方式大力榨取百姓钱物, 有了钱又能买更大的官, 于是不断循环, 卖官鬻爵制度造成南越官僚机构臃肿庞大, 官吏数量众多。如府县征收税例, 有正副提督、正副提领, 又有记录、该府、该知、记府、

¹ (澳)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对此也有统计, 称在阮氏 22 名一品朝臣中, 有 19 名祖籍清化省宋山县(见中译本, 第 29 页), 但所译人名有误, 如大将阮有镒误译为“阮有逸”, 阮久乔误译为“阮元乔”, 大将张福攀误为“钱福攀”等。在此据《大南列传前编》卷四《诸臣列传二》改正(日本义塾大学, 昭和 36 年影印本)。

书记、该总、录吏，名色繁多。18世纪70年代，南越一个村子就常有17名村长和20名社长。1769年，升华府纳税人有14349人，而官员达278名，平均每名官员拥有52名纳税人^{[14]卷三}。港口也是冗官繁吏，仅顺化港口就设有173名官员^{[14]卷四}。而相比之下，整个阮氏王朝开科取士有数可计的不到1000人，科举官员在王朝中力量之小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越南学者称：“科举制度在南部并不盛行。卖官鬻爵制度却特别发展，并被视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只需缴纳规定的一些钱和礼物即可补缺为官。”^{[17]398}由于官员众多，百姓一年收入的七八成都用来上缴官员，自己只得二三成而已^{[18]卷三、49}。阮福灏1725年登位后，曾想减省冗员，对各府县官吏编制进行裁减，但是，因触犯上下官员的既得利益而遭到反对，最后也不了了之^{[19]卷九2-4}。这种冗官繁税，使得民不聊生，阮氏王朝最终被西山起义军所灭。

虽然科举取士在南越阮氏王朝的社会流动中居于次要地位，但在南北对峙的和平时期，以及阮氏王朝的后期，一些阮氏统治者看到儒家思想和文职官员在维持和巩固自己统治的作用日益凸显，遂开科取士，开始重用文职官员，一些文职官员还登上了阮氏王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高位，儒学思想和汉文学在南越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科举在南越阮氏王朝的地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阮氏统治者对开科取士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讨论阮氏王朝开科取士、儒士在王朝中的地位乃至儒学在南越的传播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在军管制下，阮氏统治者的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当统治者重视儒学时，儒者学士通过科举考试可以进入政府部门任职，文职官员的地位有所提高，对朝廷军政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刺激士人学习儒学和汉文学；当阮氏统治者不重视儒学时，科举考试时开时停，文职官员的地位下降，士人学习儒学和汉文学之风也随之下滑。

在阮福灏主政期间（1648~1687年），曾开科5次，取中格者109人¹，这些中格者充实了阮氏王朝的文职队伍。但期间阮福灏也曾两次停罢考试，挫伤了士人学习儒学和汉文学的积极性。如1681年试饶学，只许正途士子应试，华文学士子不许入试，“自是华文学士，闻之叹恨不已，皆废学业，以致华文学

士，日以懈怠，感思奔走，以图生业也”。1684年又停罢饶学考试，儒学士子已失斯文之望，自是儒风愈下^{[20]289}。

而在阮福澗统治时期（1691~1725年）却是另一番景象。此时南北休战30余年，“海内晏然，百姓富庶，号称太平之世”^{[13]30}。阮福澗本人，“博览经史，优游翰墨，凡所著作题咏，皆有天然之妙”^{[13]24}，他重视儒学，改革科举，“招贤待士，求言纳谏”^{[11]3}，于文治武功多有建树，文职官员在政府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我们从《大南实录前编》卷七至卷八可以看到他重用文官和改革科举的一些举措。

一是尊崇孔子，衣冠制度从汉风。1692年正月令修文庙于朝山，这是阮氏王朝首次修建文庙^{[21]24}。1715年三月，又命在镇边营立文庙^{[13]卷八24}。但是，阮福澗崇尚儒学，并未意味着他放弃了佛教在南方的统治地位。1714年六月，他下令重修顺化天姥寺，并亲制碑文记之，还派人到清朝购买《大藏经》与律论千余部置于寺院。1695年，他还邀请中国和尚大汕到顺化、会安一带传播佛教。

二是改革试法。1695年三月，正途试和华文试“初行殿试法”，“南朝殿试，此为起点”^{[4]卷三}。阮福澗还亲定考题，如1701年八月阮福澗御赐题目试正途和华文学士子^{[11]卷七19}，1713年因考官不和而使正途试尽黜，阮福澗遂御赐题目，再试正途士子^{[13]卷八15}。

三是开科频率高，取士人数多，文官升至高位。据《大南实录前编》卷七至八记载，阮福澗平均3年半开科1次。有时甚至1年开科2次，如1695年，三月试正途、华文、探访，八月试文职、三司^{[11]卷七10}。1713年，四月开试饶学，八月又开科正途试、华文试和探访试^{[13]卷八15-16}。不仅开科频繁，而且每科取士亦多，如1694年二月试饶学，取正途中格133名，华文中格92名，共取225名^{[11]卷七8}，一次所取人数超过前代阮氏各王取士的总数。就可考数字统计（没有确切科次和取士人数的不在统计之内），阮福澗统治的34年间开科9次，几乎占了阮氏王朝开科总数20次的一半。他取士481名，占阮氏王朝取士总数629名的76.47%。其中正途中格人数290名，占阮氏王朝正途中格323名的89.78%；华文中格175名，占阮氏王朝华文中格279名的62.72%；探访中格16名，占阮氏王朝探访中格26名的59.23%。这些数字显示，阮福澗十分重视科举考试，选拔了一批

¹ 根据（越）阮国史馆《大南实录前编》卷四至卷五记载统计。

儒士和文学学者,他们担任知府、知县、训导职务,或到三司任职。个别文职官员还得以与武将一同带兵打仗,如 1692 年阮福澗命该奇大将领阮有镜为统兵伐占城,同时还派了文职阮廷光作为参谋前往^{[11]卷七4}。一些文官还升到了高位,如儒士阮科登升到内赞兼按察使总知军国重事。

由此可见,阮氏统治者是否重视儒学和文职人员,从其开科取士频率的高低和取士人数的多寡即可见一斑,他们对科举取士的态度与举措对文职人员地位的升降以及儒学在南越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文学儒士逐渐进入政府任职

由于北越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制度化的科举取士选拔了一大批进士进入郑氏政府,经史文学儒士大量涌现。但开发较晚的南越地区的汉文化影响较小,只是随着华人的不断到来和北方居民的避乱南迁,带来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再加上一些重视儒学的统治者的倡导,科举取士的开展,使汉文化在南越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其主要表现是文职人员逐渐进入阮氏政府部门任职。

在南越地区的文人学士中,不少家族是随阮氏南迁而来的,其中以清化、乂安地区为多。“阮家所携部曲多清、乂人,侨居附贯,其子孙有才艺见识,或以世荫进,或以考试用,亦复不少”^{[14]卷五142},这些南迁的科举、文学世家子弟,是阮氏政权文职官员的重要组成部分。香茶县安和社阮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黎朝前期,乂安开禄人郑柑,在黎朝仕至兵部尚书。莫氏篡权后,郑柑避居顺化,欲招忠义以图恢复,未果而卒。后其家族居于香茶县安和社,子孙中科举者甚多,兄弟叔侄爷孙均任职于朝廷,所以世有“学同寅,试安和”(同寅,社名,属富荣县)之语流传。阮登第,郑柑之七世孙,阮福澗赐姓阮,1701 年试中生徒,补训导,后升至正营记录,赠金紫荣禄大夫,所奏的治国方略,阮福澗均从之。阮登第之子阮居贞、侄儿阮登盛都是阮福澗时期的文职重臣,当时阮氏政权的典章法度皆阮登盛所建明,而辞令则出自阮居贞之手,他们还工于诗咏,阮居贞有《澹庵集》行于世,阮登盛有《效颦诗集》《拙斋文集》《拙斋咏史集》行于世^{[12]卷五1-15}。广平丽水武氏家族也是世代中举,任文职,以文学见长,《大南列传前编》卷五《诸臣列传三》对其家族的仕进也有所记载。

一些避战南投的北越儒士,其政治策略也得到阮主的采纳。如 1659 年乂安人司天监朱有才等来

降,上奏治国方略,阮福瀕认为此人博学多文,遂授予参政监护军职务^{[16]卷四24}。

但是,在军管制度下,受过儒学熏陶的文职官员人数的扩大,地位的上升,对武职和贵族阶层的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导致文武官员的矛盾和斗争。在阮福澗统治期间,一大批文学儒士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部门,有些儒士因得到阮福澗宠爱而获得高位。但在阮福澗去世之后,阮福澗在位 13 年间(1726-1738 年),不仅没有开科一次,而且一些因改革而得罪武阶贵族的文职官员立即受到排斥,如阮科登因请阮福澗责令贵族归还久借的国债而构怨贵族,阮福澗一去世,他便被阮久世将军所谋杀^{[19]卷九3}。

总之,阮氏王朝初年,一切政务以军事为重,文职人员只是武职官员的辅助工具,负责文秘工作。但到阮氏王朝后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一批儒官儒吏进入政府部门,一些儒士还升到了极高的职位,并在朝廷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阮氏统治者并不崇尚儒学,而是以佛教作为其统治思想。由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所决定,武备人才和贵族是阮氏政府高级官僚队伍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始终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卖官鬻爵是构成基层官吏的最主要方式,致使基层官员队伍庞大;文职官员开始只在阮氏政府部门做一些文秘性的工作,自 17 世纪中期开科取士以来,文学儒士通过科举考试或文学才能逐渐进入阮氏政府部门,在王朝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始终处于附属的次要地位。而开科取士与否和文职官员地位的升降,阮氏统治者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与北方郑氏政权绝大多数大臣是进士出身、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许是造成北方地广人多而兵弱,南方地狭人少而兵强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越南黎朝后期南北政权的科举考试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同奉黎氏正朔的两个不同政权治理下的地区,即使后来成为同一个国家——越南的南北地区,科举考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科举取士的发达与否,也决定了儒学和汉文化在越南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传播和发展。北方郑氏政权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科举制度完善,儒士官僚居于主导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北越地区科举教育的发展和汉文

化的传播和普及。而在南越地区,武职官员占居主导地位,科举士人在王朝中处于次要地位,科举教育没有得到扶植和发展,儒学在南越的传播比北越缓慢得多,传播面也极其有限,“一切纲常伦理,礼乐政教,概置不问,不过因陋就简”^{[18]卷六,128}。黎朝时期科举考试和儒学在越南南北地区的不同发展,不同地区显现出不同的特色,这给我们研究汉文化在域外传播过程中如何因应当地形势发展而变化提供了实证。

[参考文献]

- [1] (越)明崢. 越南史略初稿[M]. 范宏科,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58
- [2] (越)陈重金. 越南通史[M]. 戴可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 [3] (澳)李塔娜. 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M]. 李亚舒,等,译. 北京:文津出版社, 2000
- [4] (越)黄高启. 越史要[G]. 越南阮朝维新甲寅冬新镌.
- [5] (越)阮朝国史馆. 大南实录前编[G]. 神宗实录,日本义塾大学,昭和 36年影印.
- [6] (越)阮朝国史馆. 大南实录前编[G]. 世宗实录,日本义塾大学,昭和 36年影印.
- [7] 陈文. 越南黎朝进士科乡试考述[J]. 考试研究. 2007(4).
- [8] (越)潘清简等.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G]. 刻本,越南 1884
- [9] (越)佚名. 黎朝史记[G]. 抄本,越南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R. 1970
- [10] (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合校. 大越史记全书[G].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77
- [11] (越)阮朝国史馆. 大南实录前编[G]. 显宗实录上,日本义塾大学,昭和 36年影印.
- [12] (越)阮朝国史馆. 大南实录前编[G]. 太宗实录下,日本义塾大学,昭和 36年影印.
- [13] (越)阮朝国史馆. 大南实录前编[G]. 显宗实录上,日本义塾大学,昭和 36年影印.
- [14] (越)黎贵惇. 抚边杂录[G]. 越南古学院藏板.
- [15] (清)李仙根. 安南杂记[G]. 丛书集成初编[Z].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16] (越)阮朝国史馆. 大南实录前编[G]. 太宗实录上,日本义塾大学,昭和 36年影印.
- [17]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 越南历史(第一集)[M]. 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 [18] (清)大汕著,余思黎点校. 海外纪事[G].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 [19] (越)阮朝国史馆. 大南实录前编[G]. 肃宗实录,日本义塾大学,昭和 36年影印.
- [20] (越)阮榜中,王毓荣,等校点. 越南开国志传[G]. 陈庆洁,等主编. 越南汉文小说丛刊[Z]第一辑第二册. 法国远东学院、台湾学生书局, 1987.
- [21] Phạm Đức ch bìn Khoa Cử V C c Nh Khảo Bả ng Triều Nguyễn, Huế: Trung Tâm B o Tồn Di T ch Cổ Đô Huế, Nh Xuất Bản Thuận H a 2000

[责任编辑 王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